

性革命

威廉·赖希 著
陈学明 李国海 乔长森 译

走向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
東方出版社

在中国，封建主义的包办婚姻并未根除，漫透着铜臭味的各种形式的买卖婚姻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不少人将婚姻变为交易，将性变为商品，将爱情变为消费，人们确实还未完全获得应有的性权利，还未充分享受到“寓于爱情中的自然的幸福”。在这种情况下，读一下赖希的《性革命——走向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是很有启发的，也可以促使一些热衷于“性放纵”的人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反思。

性革命

國內外兩性學研究新動向
第十屆研討會



性革命

走向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

威廉·赖希 著

陈学明 李国海 乔长森 译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崔继新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曹 春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革命——走向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威廉·赖希著 陈学明、李国海、
乔长森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9

ISBN 978 - 7 - 5060 - 3814 - 0

I. ①性… II. ①赖…②陈…③李…④乔… III. ①性问题—研究

IV. ①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6011 号

性 革 命

XING GEMING

——走向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

威廉·赖希 著 陈学明、李国海、乔长森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

字数:302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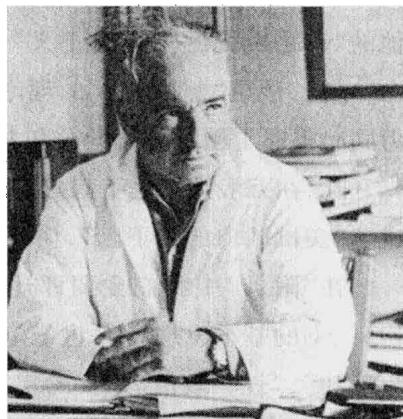
ISBN 978 - 7 - 5060 - 3814 - 0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译者序言

赖希是一位已经过世达半个多世纪的西方学者，他的《性革命——走向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一书更是出版于 70 多年前，我们之所以执著地要把此书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主要在于我们认为了解赖希其人和其书很有现实意义。它起码具有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其一，可以为人们进一步争取“性权利”，享受性快感提供思想武器。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在我们中国，封建主义的包办婚姻并未根除，浸透着铜臭味的各种形式的买卖婚姻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用权力占有性爱、用金钱收买性爱的现象也不少见，一些人将婚姻变为交易，将两性变为杯水，将爱情变为消费，人们确实还未完全获得应有的性权利，还未充分享受到“寓于爱情中的自然的幸福”。在这种情况下，读一下赖希的《性革命——走向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是很有启发的。其二，可以促使一些热衷于“性放纵”的人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反思。性压抑、性禁锢往往是与性放纵、性混乱交织在一起的。正当需要人们进一步冲破包办性爱、买卖性爱、权力性爱的桎梏之际，有些人盲目地、歪曲地追随西方“性解放”、“性开放”思潮，一味追求不受任何法律、道德和习俗约束的肉体快感以弥补精神空虚，出现了赖希



赖希工作照

所谴责的那种“性混乱”、“性犯罪”。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和所有的人们一起了解一下被奉为“性解放”、“性开放”思潮的理论奠基人原始的真实观点,是会有所裨益的。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们被赖希的相关观点所吸引,有感而发,写下了5万多字的对本书的评述,作为“附录”放在本书的正文之后。

在“附录”中,我们首先介绍了赖希曲折、离奇、短暂的一生。他早年追随弗洛伊德,成了“弗洛伊德的忘年交”,是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重要成员;后又加入奥地利和德国共产党,试图把精神分析学会所推崇的精神分析运动与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在欧洲发动了轰动一时的性—政治运动,成了“性—政治运动的发起人”;他在实践上把精神分析运动与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同时,在理论上又企图把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他是“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他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就是提出了“性革命”理论,他是“‘性革命’的理论奠基人”;他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这种努力同时得罪了精神分析学会和共产党,既被精神分析学会除名又遭共产党开除,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赴美国发展,但在美国因违反了相关法令又成了“美国政府的阶下囚”,惨死于美国监狱。

在“附录”中我们主要评述了《性革命——走向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一书的基本思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赖希总结“心理—卫生运动”、“性—政治运动”的实践,写了《性成熟、节欲、婚姻道德》一书,交维也纳明斯特出版社出版。就在赖希发动和领导“心理—卫生运动”、“性—政治运动”期间,他应苏联的邀请访问了苏联。他得出结论:苏联人民正在进行一场性质类似于他在奥地利、德国发动的“心理—卫生运动”、“性—政治运动”,而规模却大得多的深刻的家庭革命、性革命、文化革命。他在苏联作了长达数月之久的参观访问之后满怀着“希望与激情”回到了德国。1935年,他搜集了有关苏联的一些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写下了《苏联为争取新生活的斗争》。1936年,他把新写成的《苏联为争取新生活的斗争》与先前出版的《性成熟、节欲、婚姻道德》合在一起,前

者为下篇，后者为上篇，以《文化斗争中的性行为》为名出版。至于《文化斗争中的性行为》改名为《性革命——走向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那是 20 世纪 40 年代的事。1945 年，英译本《文化斗争中的性行为》在纽约首次出版，编辑嫌这一书名不吸引人，就从赖希的这一著作中挑出了“性革命”这一术语，另起了《性革命——走向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这一书名。据赖希本人考证，最早提出“性革命”这一术语的是莫斯科学院的负责人巴特基斯，巴特基斯在向他介绍苏联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时，脱口而出，说苏联正在进行一场“性革命”，这一说法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并把它引入自己的著作之中。

我们对赖希《性革命——走向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一书的基本思想的评述主要围绕着以下八个方面层层展开：

第一，赖希如何论证人类满足自然的需求的重要性，呼吁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享受自己的欢乐；第二，赖希如何把人的自然需求归结为主要是性的需求，认为“生活幸福的核心是性欲的幸福”；第三，赖希如何提出“性压抑”会形成人的“独裁主义性格结构”，“独裁主义性格结构”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基础，而性需求的满足会滋生“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又会促使社会走向民主与自由；第四，赖希如何推倒弗洛伊德把性冲动说成是“反社会的”和“与人类文明冲突”的观点，而得出性冲动是“合群的”和“与人类文明相一致”的结论；第五，赖希如何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婚姻，把婚姻理解成是“让实际爱情合法化”，提出通过“使婚姻性爱化”，来实现婚姻关系持久化；第六，赖希如何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青少年的性权利，在强调必须维护青少年的性权利的同时，



赖希的一家

又竭力反对青少年在性爱问题上的杯水主义；第七，赖希如何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家庭，一方面提出“性革命”始于“消灭家庭”，把家庭称为“制造顺从动物的工厂”，另一方面又强调所谓“消灭家庭”就是要用“自然的家庭”来取代目前这种“强制性的家庭”；第八，赖希如何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性道德，在批评目前的“性道德”的核心就是实施禁欲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以“自我调节”而不是以“强制性调节”为主要内容的新道德的设想。

我们相信，我们所写的长篇“附录”定能有助于读者领会、把握本书的基本内容，有助于读者从正面、反面、侧面受到启迪。

我们在这里郑重指出，由于国情的不同，民族传统的差异，对赖希的有些主张，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希望读者在阅读此书时无论如何要注意这一点。

本书是由本人（陈学明）、李国海、乔长森共同翻译的。具体分工如下：陈学明译三版前言、一至五、八、九、十四章；李国海译六、七章；乔长森译十至十三章。李国海校对了全稿，特别是对乔长森所译的部分作了很大的改动。李国海先生年已古稀，身体又欠佳，他怀着强烈的责任感把大量心血倾注于本书的翻译与校对之中，特向他表示敬意。陈学明所译的部分曾参考了黄勇的一些译文。陈学明对全稿作了文字上的统一校订，并撰写了《译者序言》和作为“附录”的《评威廉·赖希及其〈性革命〉》一文。

本书的翻译虽然历时很久，但由于译者水平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译文的疏误之处肯定不少，切望有关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陈学明

2010年4月12日



第四版（1949）序言

20 年前，我在奥地利收集了本书第一部分的材料，并以《性成熟、节欲、婚姻道德》为名送交维也纳明斯特出版社出版。在生物学领域，20 年是不足挂齿的，但在 20 世纪这急风暴雨的 20 年中，人类却受到了比以前几个世纪更加巨大的折磨。我们可以说，20 年中，人们用来解释和说明他们的生活的所有概念都受到了怀疑并仍然不得其解。而在这些概念中崩溃得最为彻底的，是 30 年前还牢不可破地支配着人类的强制性的性道德。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有关性生活的所有价值标准的真正变革。而其中受到最严重伤害的是那些有关婴儿和青年的性问题的价值标准。

1928 年，我在维也纳创立了社会主义性咨询和性研究学会，当初儿童和青年的性权利被剥夺了。对家长们来说，容忍性的游戏是不可思议的，更不用说把这种表现看作自然、健康发展的组成部分了。只要脑海里出现青年们在自然的拥抱中会满足他们对爱的需求这样的一闪念，马上会感到心惊胆战。任何人只要稍稍提及这些权利也会受到攻击。原来相互冲突的各类人群、各宗教派别的成员、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心理学家、医生、心理分析学家等等，在反对保障儿童和青年的爱情生活这一点上，却团结一致。许多奥地利人可能还能想起，在我的性卫生咨询所里和心灵卫生促进会上，有些道学家和智者曾预言，人类将由于道德败坏而沦落。因为我们为儿童和青年的自然的爱情生活权利而斗争，不负责任地把“人间天堂”许诺给群众的政治家们把我们从他们的机构中驱逐了出来。我们对生物学需求的纯临床保护的经验表明，必须改变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建立青年公寓；确保家长、教育者和青年人生活安定；改变教

xi

xiii

育者的性格结构；批评一切其活动和存在都依赖于那些从性格学上讲是孱弱者的政治运动；促使人类内在方面的自我满足，并随之促使整个人性的自我满足；发展儿童的自我调节能力，以使他们最终成为独立的成年人，所有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们都是一场人的生物构造方面的伟大革命的开端。

来自各方面的对这项社会卫生工作的巨大压力迫使我决定动身去德国。1930年9月，我放弃了自己在维也纳生气勃勃的医疗实践和心理分析的教学工作而来到柏林。此后我只有一次回到奥地利，那是1933年的4月。在这个短暂的逗留期间，在一次给维也纳大学生大型聚会的演说中，我有机会概述了我对法西斯主义的某些看法。对于作为一个精神病学家和生物学家的我来说，德意志灾难的渊源是人类大众在生物学上的软弱无能，他们被一小撮渴望权力的强盗所支配。在此时此刻，维也纳学术界的年轻人能给我以理解，使我感激不已。但政治家们对我却是不屑一顾的。

自那时以来，人这种动物的生物学问题变得无限严重了。1949年3月的今天，在美国，我们的周围到处爆发了严肃的斗争，以认识几十年来人类所经历的那场生物学革命。在这一点上，为避免误入歧途，我们不必谈论细节。但有一个事实必须予以充分强调。

有些问题，在1920—1930年间的奥地利，谈论它们是不可想象的，也是危险的，但在今天，在1949年的美国，已成了人们争论的习以为常的话题。这个变化大概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1946年。随着报纸上主张儿童的性自我满足是自然的文章愈益增多，这种变化也愈益明显。包罗万象的心灵卫生运动深入于美国的公众意识之中。现在大家认识到，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人类性格结构问题的解决^①。特别是，在以前的20年中，自我调节的概念已在儿童教育中相当流行了，而今天开始对一

^① 所谓“性格结构”，指的是个人所特有的一种结构，是个人某种固定的行为和反应方式。“性格”这一倭格昂概念(ergonomic concept)是动态的、生物学的概念，而不是静态的、心理学的或道德学的概念。

大批人有吸引力了。当然，这里，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可以看到高高在上的性伪君子、政府的官僚和最坏的政治爬虫，这些人一听到自我调节，就怒从心头起。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心灵卫生运动和对儿童与青年的自然的、生物学的性欲的肯定正在稳步前进。这是再也不能阻止的了。对生活的否定正面临着对生活的肯定。

我并不认为，胜利已经在握，我们还得面临几十年的艰苦争论。但我确实认为，对自然的爱情生活的基本肯定正在势不可当地前进，尽管还有许多危险的敌人。就我所知，美国是把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列入宪法的唯一的一个国家。当然，请读者放心，我也完全意识到美国的反动思潮的存在。但只有在美国，才有可能争取幸福和人权。完全赞成在教育中实行性机制学^①原理的亚历大山·尼尔的几千册《家庭问题》刚出版便被抢购一空。我这本《性革命》也同样受到了青睐。在美国，存在着强大的、基础牢固的家长—教师结构，它们都捍卫儿童的自我调节和性机制学原理。大学也教授生活原则，包括性这一因素。当然人们不时还会发生犹豫、沉默甚至对立现象，但大众的性卫生已在大踏步地前进了。xiv

我本来会很乐意将本书加以扩充，并增加今日的知识使之跟上形势。但我不得不放弃这种打算。本书在反映 20 年代的性—政治条件方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本质上，它在今天还是有效的。自 1930 年以来在性机制学领域所作出的科学和医学发现都已经完全公之于众了。因此，我使这本《性革命》基本上保持了其原貌。在这样做时，我必须再次强调，17 年来，我的工作是独立于任何政治运动和党派的。它已成了有关人生的一项工作，一项常常与威胁人生的政治尖锐冲突的工作。

威廉·赖希于纽约，福留斯特山

1949 年 3 月

^① “性机制学”指的是一种关于倭格昂(ergonomy)的知识体系，它是一门有关机体的生物能量的机制学，论述有关生物能量的事。



第三版（1945）序言

xv 我的著作《文化斗争中的性行为》^①一书的第三版在此首次以英文问世。本书在题材上没有任何变化，但对术语作了许多必要的修正。

本书中的材料最早是在 1918 年至 1935 年间以欧洲自由运动为背景加以收集的。这场运动抱有一种错觉，并以这种错觉为根据，认为独裁主义的意识形态等于“资产阶级”的生活过程，而自由则反映了“无产阶级”的生活过程。欧洲自由运动铸成了这一根本性的错误。过去 12 年的社会事件以血的事实驳斥了这个错误：独裁主义的和进步的意识形态与经济学的阶级划分无关。一个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并不直接反映它的经济条件。人类大众的感情的和神秘的冲动在社会过程中至少起着与纯粹的经济利益同样大的作用。在所有国家的所有社会阶层中都有进步的思想和行动，同样也都有独裁主义性质的威胁。在性格结构上，存在着经济和社会的区别，但没有阶级的区别。这并非像理论社会学机械地认为的那样，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问题。相反，具有自由结构的工人与具有独裁主义结构的工人作斗争，与社会的寄生阶层作斗争；有着自由能力的上层社会阶级成员冒着生命危险为所有工人的权利同从无产阶级营垒中上升起来的独裁者作斗争。1944 年的苏联，虽然具有无产阶级革命传统，但是很遗憾，就性政治学而言，是反动的；而渊源于资产阶级

xvi 革命的美国，在其性政治学方面，则至少必须说是进步的。完全按照经济学确定的 19 世纪的社会概念不再适合于 20 世纪文化斗争中的意识形态

^① 第一版于 1930 年出版，第二版于 1936 年出版，第二版出版时增加了内容。

的形势了。简而言之，今天的社会斗争是在那些想捍卫或肯定生活的力量与那些想毁灭和否定生活的力量之间展开的。今天主要的社会问题不再是：“你是富人还是穷人？”而是：“你是否支持并为确保人生最大可能的幸福而战斗？你是否在尽你所能地使数百万劳动者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独立生活，并在可见的将来实现社会生活的完全自我调节？”

很清楚，谈论上面具体地予以描述的这个基本的社会问题，必须把甚至是人类共同体中最穷的人也具有的那种生活功能亦考虑在内。在这方面，15 年前我所指出的性压抑的意义起了巨大的作用。社会和个人的性—经济学已经确立了这样一个事实：对青少年性生活的压抑是产生被奴役的下属与经济上的奴隶的关键因素。所以，现在问题不再是一个人是否具有一张白的、黄的、黑的或红的党员卡以证明属于这个或那个思想教派。相反，它显然是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是否充分地肯定、支持或者捍卫新生儿、小孩、青年人、成年男女的自由的生命表现，或者说一个人是否压抑或毁灭这些表现，而不管所使用的是何种意识形态或托辞，不管是为了这个还是那个国家，不管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也不管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佛教。这是普遍真理，而且只要有生命存在，它将始终是普遍真理。如果我们想永远消除对人类劳动阶级的有组织的欺诈，如果我们想在行动中证明，我们在严肃地采取民主的理想，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识这一真理。

今天，对彻底改变性生活条件的必要性的认识已经渗透到了社会思想之中并很快地站稳了脚跟，对儿童的性欲的重视和关心也越来越普遍了。确实，对青年的性生活的社会支持还很缺乏，正统的科学仍不愿讨论以青春发动期间性问题为代表的棘手问题。但是认为青春期的交媾是一种自然的不言而喻的需要的看法似乎不再像我 1929 年初次讨论这个问题时那么骇人听闻了。性机制在这么多国家获得成功，是由于许多良好的教育者和能够理解人的家长认为青少年的性要求是完全自然的和合理的。尽管我们还有造成重大创伤的臭名昭著的中世纪的性法律和可怕的教养所，但关于青少年性生活的理性思考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一个新的启蒙时期必须使自己面对强有力的中世纪非理性主义的残余势力。尽管还有人持遗传性退化论(hereditary degeneracy)和犯罪偏离说(criminal deviation),但对犯罪和感情疾病的社會原因的认识到处都有突破。尽管还有不少医生提议应束缚幼儿的双手以免手淫,然而许多銷量很大的日报时有反对这种规定的报导。尽管还有些年轻人因满足他们自然的爱的功能而被送到教养院,但还是有不少法官认识到这种法律和机构乃是社会的罪恶。尽管还有大量教会记录和说教谴责自然的性欲,视其为恶魔的杰作,但想当牧师的人中从事社会工作而抛弃传统道德的人数却在日益增加,甚至有些主教也主张生育控制,即使他们将此仅限于合法婚姻。尽管许多的年轻人开始抱怨争取爱情幸福的斗争之艰辛,但是一个父亲由于谴责自己的女儿没有结婚证书便生儿育女,还是在电台中受到了公众的责难。尽管还有对离婚者敲诈的强制性婚姻法,但人们对这种法律和离婚程序越来越厌恶,并影响到整个共同体。

xviii 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我们的文化存在的真正革命性的变革。在这场斗争中,没有游行,没有军人,没有奖章,不敲锣打鼓,不鸣放礼炮,但充当这种战争牺牲品的人却不会比1848年或1917年的内战少。人类对其自然的生命功能的反应正从千年沉睡中苏醒过来。我们生活中的这场革命触及了我们情感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存在之根本。

剧烈的变革主要发生在作为社会的唯一致命的薄弱环节的家庭生活中。而这里的变革以一种混乱的状态出现。之所以呈混乱状态,是因为它们深深地动摇了渊源于古代家长制的独裁主义的家庭结构,并使之成为一种较好的、较自然的家庭组织。本书并不攻击自然的家庭关系,但反对由严格的法律、人的结构和非理性的公众意见所支持的独裁主义的家庭形式。苏联1917年社会革命(本书第二部分将作讨论)后的情形正是这样,它表明这种变革具有情感的和社会的危险性。苏俄想在20年代短时间内通过暴力解决的问题,今天正在整个世界范围得到解决,虽然速度慢些,但要深刻得多。当我谈及我们文化生活条件的革命性变革时,我主要指的是取消家长制的独裁主义的家庭形式,而代之以自然的家庭关

系。但正是这种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自然关系面临着最危险的障碍。

“革命”一词在这部性一经济学著作中，与在其他同类著作中一样，并不是指使用暴力而是指使用真理；并不是指举行秘密集会，散发非法传单，而是指对人的良心的直接的、公开的警告，没有遁辞，不绕圈子；并不是指政治犯罪、暗杀、签约和毁约，而是指“抓住事物本质的理性革命”。^{xix} 性机制同医学中微生物和无意识情感生活的发现、物理学中力学规律和电的发现、经济学中生产力和劳动力的发展，具有相同的革命意义。性机制之所以是革命的，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的性格结构的形成规律，是因为它不再把人对自由的渴望建立在口号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生物能的功能规律上。我们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而不是从神秘主义、机械论、政治学的观点看待生活过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革命的。而活的有机体中起着生物能作用的宇宙的“倭格昂”能的发现，使我们的新会研究有了一个植根于自然科学的坚实基础。

我们时代的发展到处都在争取一种无条件的人类共同体和国际主义。政治家管理政府必将被代之以对社会过程的自然科学的调节。关键的是人类社会，而不是国家。我们关心的是真理，而不是策略。自然科学面临的最大任务是要为扭曲了的人性的未来命运负责。政治学最终将成为一种带着不同目的的纯粹的政治讨论。自然科学家，不管喜欢与否，将不得不指导社会过程，而政治家也不能不学会做某些有益的事，而不管是否愿意。本书的任务之一是帮助这种到处受到围攻的新的、理性的科学的生活秩序突出重围，促使其不那么痛苦地、少付出一点代价地诞生和成长壮大，任何有教养的、对生活负责的人都不能，也不会误解或滥用这本书。

威廉·赖希

1944年11月



第二版（1936）序言

xxi 1935年10月,300名最有名的精神病学家向世界的良心发出了呼
唤。那时意大利向埃塞俄比亚发起了第一次进攻。包括妇女、老人和儿
童在内的数千名毫无防备的人在这次进攻中被杀害。人们开始认识到,
如果出现另一次世界大战,将有多少人会死于战祸之中。

像意大利这样一个有着成百万受饥挨饿的人的国家竟会如此狂热地、除了少数例外几乎没有遭到任何反抗地听从战争的呼唤,虽在人们的预料之中,但还是不可思议的。它增强了这样一种总的印象:整个世界都允许自己受那些精神病学家称之为心灵紊乱的人统治,特别是——世界各地的人确实都患有情感病;他们的情感反应是变态的,是与他们自己的愿望和真实的能力相矛盾的。情感上的变态反应的症状有:在充裕之中挨饿;尽管有可以利用的煤源、建筑机器和数百万平方米的可供建筑的空地,却受冻挨淋;相信长着长白胡子的神圣的力量能指导万物,而人完全受这种力量的支配;兴高采烈地去伤害那些未曾伤害过任何人的人,并相信有必要去征服某一个前所未闻的国家;衣衫褴褛,到处乱跑,并认为某个人体现了他所属的那个民族的“精华”;期望无阶级社会,同时又把存在着奸商的“人类共同体”看作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忘却一个国家元首在上任前的许诺;普遍地赋予个人,即使是政治家,以支配其生活和命运的权力;闭眼不看这样的事实——即使所谓国家领袖和经济巨头也得像普通人一样吃饭睡觉、拉屎撒尿,也具有性冲动,也受无法控制的情感所支配;把为了有“教养”而对儿童进行体罚视为理所当然;禁止精力旺盛的青少年享受性交的快乐……这可以无限地列举下去。

从本来是非世俗的、被认为是非政治性的科学的观点来看，精神病学家的呼吁具有一种官方的政治色彩。但这种色彩是不完全的。它尚未触及它正确地加以描述了的现象之根。精神病学家并不从当代人普遍的情感疾病的本性出发。他们并未去探究群众为了一小撮政治家的利益而极其心甘情愿地去牺牲自己的根本原因。他们没有注意到在需要的真实满足与同宗教狂热者的狂喜状态有关的民族主义狂热中的虚幻满足之间的区别。他们并不试图理解何以群众在经济生产力大大提高以至本可引向一种理性的有计划经济的情况下，仍甘心于饥饿和贫困。问题不是政治家的心理而是群众的心理。

现代的政治家是金融界巨头或独裁者的朋友、兄弟、堂表兄妹或岳父。大量有思考能力的人，不管是否受到教育和熏陶，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并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不能通过对个人的精神诊断的考查来解决的问题。情感疾病、显示性的混乱思维、屈从、情感奴役、自我伤害、对领袖的坚信不疑，等等，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刻板、单调的生活（特别是性生活）中的一种紊乱，而这种刻板、单调的生活是生活的机械化所固有的。

心灵疾病的奇怪症状仅仅是那些想通过祈祷逃避战争的群众的神秘和轻信态度的极端表现罢了。具有收容 4% 的人的能力的全世界的精神病院，并不比政治机构更关注人们的性生活。正统的科学至今尚未涉及性欲问题。然而变态的情感反应渊源于对未满足的性能量的病理学引导，这一点是再也不容置疑的了。因此当我们提出有关对人的性生活的社会调整问题时，我们就触及了情感疾病的本质。

性能是在心灵中决定人的感情与思维的性格的生物能。“性欲”（从生理学上说，即是副交感功能）本身就是一种充沛的生命能。它的压抑不仅导致身心紊乱，而且也导致表现在最无目的的行动、神秘主义、好战等等中的社会功能的总失调。因此性政治学的出发点必须是：人的性生活为什么受到压抑？

让我们简述一下性机制是如何把情感生活同社会经济秩序联系起来